

【主持人语】(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铭玉教授) 本专栏设立的宗旨是探讨翻译学的开放性问题, 选取的视角为符号学。《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是一篇理论探索性文章, 从符号的过程、行为、关系、层级、间性、守恒、功能 7 个方面切入翻译学, 试图构建一门新兴的翻译符号学框架。《雅可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是一篇批评商榷性文章, 对学界广为推崇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三重译域说”提出了质疑和批评, 同时, 依据符号学家洛特曼的“符号域”思想, 构拟了适用于翻译符号学的域内、域际和超域三类译域范畴。《翻译动机的社会符号学诠释》是一篇理论阐释性文章, 在社会符号学的视野下, 就翻译动机的本质、特点、产生原因和对翻译方式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理论阐释。《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文本再生——以〈红高粱〉小说、电影剧本、电影台本为例》是一篇应用描写性文章, 作者的研究视角为翻译符号学, 其主旨是把理论引向案例分析, 选取的比读对象是《红高粱》的 3 种文本, 通过对三者的符指关系和符号转换过程加以研究, 对影响翻译过程的符号本体内部和外部因素加以创造性的描写。《彼得·特洛普的翻译符号学观》是一篇思想引介性文章, 通过对爱沙尼亚符号学家特洛普文化符号学翻译观的介绍, 论述了文化的层级符号性质、文化和文本的关系以及翻译学的符号学取向问题。专栏的 5 篇文章虽然角度不同, 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 探讨翻译发生过程中的符码转换现象及相关问题。就此来看, 翻译符号学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

## 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

王铭玉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天津 300204)

摘要: 翻译符号学是以符号学理论为指导、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本文旨在从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符号守恒 7 个层面探讨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 展望翻译符号学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翻译符号学; 学科内涵; 符号转换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16) 05-0001-10

### 0. 引言

符号学是翻译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近 30 年来符号学翻译研究体现出如下 6 个特征: 1) 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和解释翻译现象和过程; 2) 考察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的渊源与应用; 3) 符号学翻译本体各层面的探索; 4) 隐喻、习语、数词非指称性、文化负载词等的微观探讨; 5) 符号学理论用于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的应用研究; 6) 中国符号学翻译理

收稿日期: 2016-01-07; 作者修订: 2016-03-15; 本刊修订: 2016-07-14

作者信息: 王铭玉 (1958-), 男, 河南洛阳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言符号学, E-mail: mywang2@163.com。

论与实践的综合宏观考察。客观地讲，符号学翻译的研究仍停滞于“脚注式”理论探索阶段，没能真正系统运用符号学方法论指导翻译研究，实现符号学与翻译学的深度融合。于是，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借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以翻译中的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创建具有自治性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我们知道，厘定学科内涵关涉一个学科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就翻译符号学而言，要把握其学科内涵，应该综合考虑翻译中符号转换涉及的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守恒、符号功能等层面，现分别进行扼要阐述。

1. 符号过程与翻译

博厄斯·贝耶尔 (Boase-Beier 2011: 7) 从过程来考察翻译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任何用不同的词去言说同一件事情的转换就是翻译过程，这为把任何再现理解为翻译提供了可能的开放空间。”翻译活动是一个符号过程，是符号主体即译者针对原文本信息，采用另一种符号系统解构文本信息，建构另一全新符号文本，其中关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动态阐释关系。原文本是阐释的出发点，译者以源语为工具获取信息，在全面考虑符号本体层面的指称、意义建构和文本组织以及符号本体外部层面的语用文化信息基础上，以目的语符号形式建构文本，呈献给读者品读。库尔 (2014: 69) 指出“符号过程假定了多义性。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彼此不相容或是部分不相容的符码 (或语言) 进行互动时，就产生了符号过程。”

如图 1 所示，信息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原文信息由信源产生并发出，经编码、调制变换成符号形式 (原文)，通过信道传输，再经解调、译码转换送达信宿，最后将符号还原为译文信息。作为信源，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提供的信息是无限的，而作为信道，符号媒介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符号传递无限的信息，必然造成符号意义在阐释上的模糊与不确定。费斯克 (2008: 3) 认为“解读是一个发现意义的过程，而意义发生于读者与文本进行互动或者协商之时。当读者将他的文化体验中的某些方面加之于构成文本的代码或符号时，就会有意义的协商。”作为信宿，人类的大脑需排除“噪声”的干扰，运用有效手段消除原文意义的模糊性，使不确定的意义达到相对的确，从而在交际系统中最大限度地产生正反馈回输。

图 1. 信息符号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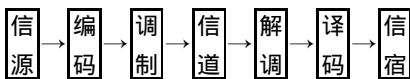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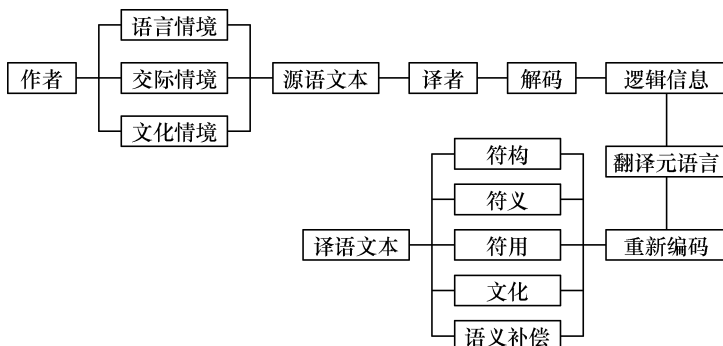


图 2. 翻译过程的编码、解码与重新编码



代码作为社会符号，决定着说话人对意义的选择以及听话人对意义的理解所依据的符号

组织原则。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风格的说话人，拥有至少一种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在每次社会交际中都会伴随着代码的转换。社会结构控制着语言，语言通过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传递。语言符号系统是翻译研究的本体论依托，文本是语言结构转换过程中阐释的出发点。“理解在本质上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一方面它在创造不同（词语与对立词语），另一方面，它在二者之间寻求相似（词语及其翻译）。”（特洛普 2014: 31）经过对原文的理解，翻译的过程表现为一个符号线性过程：解码——编码——重新编码。这里的解码和编码都是在原文基础上对信息的获取和组织，而重新编码则是在目的语基础上做出的一种文本建构。

## 2. 符号行为与翻译

“过程”使得符号和“行为”联系起来，比如皮尔斯就将符号过程界定为符号行为，指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解释关联物之间的三元作用，即符号催生受该符号制约的解释项符号，使其与所指对象建立对应关系，进而指称所指对象。如果将符号学与翻译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符号行为。

首先，翻译是阐释符号行为。皮尔斯认为，所有思想皆潜存于符号之中，供使用者阐释。翻译也不例外，因为翻译不只是语言符号系统间的操作问题，还涉及两种文化附加值的等值性和可译性，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阐释行为。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信息的交流，从这一点看，它是一种借助符号进行的交际行为。任何翻译都会带有译者主体的影子，与他过去的经验和阅历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他自己心中之物”（韦伯 1998: 7）。译者对原文本的词汇语义、句法结构、文本题材、主题、交际情境、模态等进行理解，得出信息逻辑链，我们称之为第一阐释项。第一阐释项的形成过程包括对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如语调、发音的动作等）的操作，基于文本情境的意义判断依靠的是译者以往的经验。此外，译者借助不同符号系统建构的语义补偿也在其中。翻译文本对目的语读者语义潜势的影响的总和为第二阐释项。阐释项与人的主观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阐释者在发挥符号主体创造性的同时，也往往会遭到人们的质疑。这告诉我们，虽然阐释体现了符号生命的所在，但阐释也有自己的限度。

其次，翻译是顺应符号行为。从语言顺应<sup>①</sup>角度讲，语言符号行为是语言符号发挥功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编码者和解码者根据上下文语境不断选择符号，以便达到理想的交际意图。编码者因应交际需求（心理动机），按照现有社会规约或惯例，在不同意识水平上不断地灵活选择语言符号，传达意义内容，形成符号意义文本；解码者则从符号文本入手，结合原文本所在的语言符号外部环境因素、语言结构和语境因素，阐释文本符号内容，以目的语言符号域的语言使用现实、社会规约或惯例为依据，通过动态顺应手段呈现原文本内容，满足跨越语言符号媒介的交际需要。洛特曼的观点对于“顺应”的理解是非常有益的，他认为，同一个文本对不同的读者来说包含着不同的信息，“文本就像是一个活的机体，每一次成功阅读的信息会随着重复阅读被读者吸收并产生影响”（Lotman 1977: 355）。

再次，翻译是情境符号行为。韩礼德（Halliday 2001: 110）认为，情境类型就是一个符号结构，情境类型的符号结构体现为三维组成：语场（正在进行的社会行为）、语旨（涉及的角色关系）、语式（符号模式或修辞渠道）。而这3种情境透过符号行为决定语言的功能成分，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分别对应起来。从翻译符号学角度来看，概念功能体现译者的经验和记忆，反映内心活动；人际功能体现作者和译者、译者和读者的关系，反映

外部关联; 语篇功能体现语码的组合与转换, 反映译语机制。

最后, 翻译是制约符号行为。符号行为是一个复杂过程, 通常要涉及符号使用者、符号使用语境(符号生活形式)和社会历史文化<sup>3</sup>大因素。就翻译而言, 译者作为符号使用者, 既是符号的创生者又是符号的阐释者, 但不论是符号创生还是符号阐释均涉及符号使用语境和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作为一种制约符号行为, 翻译或表现为译者在解码过程中受到环境(如心理、社会、文化、阅历等)刺激产生一些行为反应, 从而出现了符号与固有所指之间错综复杂的不和谐关系; 或表现为译者的族别差异、语言文化类型差异、地理区域差异等导致翻译活动沿着译者所属族别语言文化方向发展, 派生出各色的符号变异体及其所指关系, 引发区别性符号关系或行为, 产生符号使用中的不和谐噪音, 使得语码转换中一定程度上出现意义失调或信息干扰现象, 影响了符号使用的效率, 如文学文本中的个体化语言符号及社会群体内部使用的集团语、行话、黑话等。

### 3. 符号关系与翻译

符号转换过程必然涉及符号关系问题, 比如符号的二元关系: 能指与所指、组合与聚合、常体与变体、词汇与实物等; 符号的三元关系: 语内—语际—符际<sup>3</sup>类译域、内在一指称—语用<sup>3</sup>类文本符号、语构—语义—语用<sup>3</sup>个符号世界等。

索绪尔(1980)认为, 所指与能指的联系是任意的, 任意性保证了它们各自的独立, 即能指无法被缩减为概念, 而所指也不依附于一种特定的能指。一个孤立的能指可以具有多种含义, 这就是多义性; 反之, 一个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能指中得到表达, 这就是同义性。巴尔特在《当代神话》中对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延伸, 在此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第一系统、第二系统等的区分。在第一系统中考察的都是最基本的语词, 能指和所指呈现的关系为: 二者都是人创造的;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 即能指可以结合任意的所指; 能指和所指必定是一一对应的, 比如英文 tree 对应“树”的概念。在第一符号系统之外, 巴尔特将“一束玫瑰花”引入视野, 并将其作为一个符号, 能指即是作为实体的玫瑰花, 所指为“爱情”“激情”等, 两者之间产生的联系构成了符号“玫瑰花”。作为符号的玫瑰花是充实的, 富含意义, 因而不同于作为实体的玫瑰花, 因为能指本身是空洞无物的。显然, 在第二系统中, 能指和所指的一一对应关系发生了变化, 具体表现为: 有能指并不一定对应有所指, 一个能指也有可能对应多个所指。比如“红”这个词, 从第一系统角度来分析, 就是红色, 指“可见光谱中长波末端的颜色, 是三原色之一”。但把“红”放在第二系统中进行分析, 就可以读出很多意义: 激情、血腥、浪漫、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斗志、革命等。因此, 从翻译符号学角度来看, 译者在解读文本时应格外慎重, 因为在脱离第一级的语言系统之后, 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和非常不确定, 这是因为我们的世界不可能总停留在第一系统上。

索绪尔参酌符号的排列与互动方式, 提出了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说法。前者以语言的线性特征及现实使用序列中的要素为基础, 凸显语言符号的空间延展性, 排除了同时出现两个要素的可能性, 指出每个符号要素的前后排列均依照区别原则; 后者基于语境外符号依据共同点在记忆中的关联, 它们的联结方式不是以线性为序, 而是借助潜存于头脑、经过长期积累形成的各类符号库。叶尔姆斯列夫进一步将具有心理学色彩的联想关系理解为语言符号序列中各单元之间潜存的析取关系, 将具有线性特征的组合关系理解为语言符号序列中各单

元之间潜存的合取关系,两者形成了一种具有时空特性的语词结合逻辑关系,为语言符号结构序列内的符号转换提供了阐释的逻辑关系原则。就翻译而言,无论是口语形式还是书面语形式的翻译都是一种交际,其目的和功能体现在译文中。为了达到翻译的合理性,我们需要全面考察交际情境的各种组成因素,如交际发生的时间、翻译的形式(口语或书面语)、翻译接受者、译者等。符号意义与形式非一一对应的属性,允许出现多个符号表达一个意义或一个符号有多个意义的情况,这就存在符号的组合选择与聚合选择问题。译者首先是原文的读者,同时又以原文第二作者的身份进行翻译。原文和译文之间通过词汇层、句法层、文本层等语言形式层面以及修辞的、文化的、宗教的等隐含因素的转换建立联系,语义关系通过符号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得以实现。

符号的二元关系往往构成一种命题的“逻辑框架”,它暗示着符号转换其实就是两个符号之间对应关系的符号系统移植,这与翻译符号学是一脉相通的。与二元关系相类似,受到皮尔斯符号三元观影响,许多研究从二元对应关系走向融合文化生活形式和非言语成分的语言游戏模式,凸显了阐释者以及三元关系在动态符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符号三元关系始于皮尔斯的“符号代表项—对象—解释项”的存在关系划分,以及“象似符—指示符—象征符”的符号属性划分,进而衍生出与“象似符—指示符—象征符”一一对应的“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三级符号”3个符号层级。作为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莫里斯在汲取皮尔斯、卡尔纳普的符号学研究成果之后,尝试建立一个符号系统的三元世界。他认为符号不仅包括语言符号,还包括非语言符号,任何符号都由“载体—所指—解释项”3部分构成,进而形成形式(符号与符号之间)、存在(符号与所指之间)和实用(符号与解释项之间)3种符号载意类型,在意义研究领域分别形成内在(义素形式之间)、指称(符号与所指之间)和语用(符号与解释项之间)3种语义文本类型,从语言符号关系角度来看则形成了语构(符号之间)、语义(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和语用(符号与使用者之间)3种语言结构类型。在三元关系理论中,与翻译关联度最高的是美国符号学家雅可布森的翻译类别说。他受皮尔斯符号三元观的影响和启发,以诗学文本和艺术符号转换为切入点,提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3类译域,分别探讨一门语言内部不同文体或不同时期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不同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以及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符号转换,为符号转换的译域划分和理论分析提供了参考依据。

#### 4. 符号层级与翻译

层级性不仅是客观世界的主要属性和特征,也是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基本手段。所谓符号层级,指逐级构成性关系的结构形式,下一级符号通过相似度关系构成具有新性质的上一级符号,如象似符(一级符号)上升为指示符(二级符号),指示符(或象似符直接)上升为象征符(三级符号)。从生物进化论视角看,代表一级符号的象似符发展为代表二级符号的指示符,而后上升到代表三级符号的象征符,可以视作一个类比符号使用的生长过程。换言之,由一级符号到二级符号再到三级符号的转换是符号生长过程中意义指称不断进化的结果,也是符号转换的机制所在。

符号生长的过程一方面形成了表达式的连续体,另一方面将符号与外界的实际事件、事物或状态连接起来,但是“把符号与其内容进行组接并不意味着生产过程的终结,还需将符号和实际事件进行比较并揭示出发送者与接收者的关系”(王铭玉等 2013: 84)。翻译的阐

释过程就是源语文本符号系统的生长过程,跨越语言界限与文化界限就是为了与目的语文化进行对接,其指向就是对目的语接受者产生理想的影响并出现一种互动。从符号学角度来解释,交际就是交际者应用符号在被交际者身上引起了符号过程,交际手段就是交际中使用的符号,交际内容就是通过交际手段建构的交际者与被交际者之间的共有意义。皮尔斯(2014: 258)认为,“共同解释项会在发送者和解释者中都建立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在交流之前是不存在的”,交际的本质就是在交际者与被交际者之间建立一种至少是暂时的共识或者可以称之为相似性认识,这种相似性导致了交际者与被交际者的共同化。“语言符号对于一个给定的语言社会的成员是具有某个意义的共同核心的”(莫里斯 1989: 146),这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人们之间正常交际得以实现的基础。

符号是人类作为主体认识客观世界的桥梁,不但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结果,也是认识世界的方式,更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依存条件。“符号活动是物种生产和理解以自身方式对认识输入进行处理和符号化所必需的特殊模塑类型的能力。”(库尔 2013: 51)符号体系则是人类对现实的呈现,是人类再现世界的模式,表达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故而被称作模式化体系(王铭玉等 2013: 120)。洛特曼提出的模式化体系将作为人类符号核心成员的“语言”分为自然语言(如英语、汉语等人类原生性符号系统)和人工语言(人类创造的常规信号语言,如科学言语以及兼具行为符号性质的路标等)。自然语言是各民族在认识世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语言,它是最早也是最强有力的人类交际系统,是人类描绘世界的语言图景,洛特曼把它们归入第一模式化系统;在第一模式化系统基础上模仿语言符号结构(组合与聚合关系)建构的符号系统为第二模式化系统,如风俗习惯、道德法令、宗教信仰、仪式规范、文学艺术、影视音乐、雕刻绘画等领域内以语言结构为基础的非语言的文化系统,因而具有自然语言组织信息以外的文化意义。文化符号(第二模式化系统)和自然语言符号具有意义信息传递的同构功能,这为彼此之间的符号转换提供了可能性。传统的翻译活动主要在第一模式化系统中进行,但如果上升到符号转换的高度来看翻译活动,就必须同时考虑两个模式化系统,而且还要把第二模式化系统放在一个重要位置来审视。

第二模式化系统符号具有典型的民族文化特征,旨在以自然语言符号突出文化意象效果,吸引阐释者的注意和解读,从而达到传达深层含义的目的,这就形成了符号的前景化<sup>②</sup>。前景化以自然语言符号为背景,突出的是自然语言符号(形位、音位、词位、句、篇章)层面的偏离,以特殊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模式,强调文本符号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和文本意义(内在、指称和语用)。前景化突出的虽然是自然语言符号的偏离,但仍以自然语言符号的组合和聚合关系为背景,故而分为组合前景化(平行结构)和聚合前景化(变异)2类。组合前景化强调词汇、语义、句法、形态、音位、书写等层面的平行或同构,呈现各层级之间相似或相异的外部联系,以便凸显特定的文化效果;聚合前景化强调词汇、句法、语音、书写、语义、方言、语域、时代等层面打破自然语言符号使用的规范和惯例而形成的变异,呈现各层级之间的变异表象,从而凸显特定的文化效果,达到表达特定信息的目的。符号的前景化思想为符号转换提供了平行和变异的符号文本类型作为参考,为符号转换和翻译提供了必要的模式化样本及参照系,对自然语言组织结构信息以外的附加意义即文化价值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概括起来讲,在翻译活动中,源语携带的文化附加值和历史语境是交际的重点,这正是翻译的价值所在,因为一切价值在于区别。从符号模式化系统角度来

观照,翻译过程就是对第一模式化系统和第二模式化系统的全面考察,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那部分共同的语义实质与特定物理文化环境联结模式的相似性成为语言间可译性的先决条件。而第二模式化系统所附加的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如意识形态、哲学、宗教、仪式、生活方式等,正是翻译跨文化阐释研究的重点内容。

### 5. 符号间性与翻译

如赵毅衡(2010: 2)所言,任何一个符号文本都携带着大量社会约定和联系,这些约定和联系往往并不显现于文本之中,而只是被文本“顺便”携带着。可以说,所有的符号文本都是显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这种结合使文本不仅是符号的形式组合,而且成为了一种渗透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动态构造。就本质而言,这种文本符号结合体就是文本符号意义生长和延伸的结果,形式上通过由符号A到符号B的转移体现出来,即符号B吸收了符号A的某部分符号意义成素,这种符号意义的生长被称为符号间性(吕红周、单红 2014: 76)。也就是说,一切文本均处于相互影响、转换、交叉重叠的文本模式网络之中,这影响着阅读、阐释和不同系统符号之间的转换。

从符号转换过程角度看,翻译过程中的符号文本A与符号文本B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符号间性关系,是因为两个符号文本是“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产生、活动、发展的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思维意识结构以及思维方式的表现形式和手段”(王铭玉等 2013: 122),因而构成了两个以有序结构与无序结构的不断位移、侵蚀、吸收为特征的文本符号域之间的文化信息传递。这两个文本符号域之间的转换必然涉及两个民族的文化,因而也就必然涉及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化间性、符号间性问题,也就是互文性问题。

在文本层面,互文性强调A符号文本与其构成文本之间的关系,即A符号文本与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改造的符号文本( $A_{1-n}$ )之间的关系,且须依据互文信息才能理解A符号文本,这些互文信息体现在语词、修辞、题材、文体等层面。从符号转换角度看,作者从酝酿构思到写作文本A,从文本A翻译到文本B均属于这种互文关系,前者属于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后者为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但由文本A构成的文本 $A_{1-n}$ 、由文本A转换成的文本B以及随之转移过来的文本 $A_{1-n}$ 的跨符号变体 $B_{1-n}$ ,均处于错综交织的文本模式网络之中,但翻译符号学不能只停留于在文本网络之中来考察文本之间的传统与变异,而须深入到影响文本的符号世界中,联系文本生成者及作为文本客体的译者和读者来研究原文本与译文本的历史生成方式。

文本主体 $_1$ (作者)与主体 $_2$ (译者)、主体 $_2$ 与客体 $_1$ (原文本)、主体 $_3$ (读者)与客体 $_2$ (译本)之间的关系与对话一直是翻译研究关注的课题。互文性之于符号转换的作用在于彰显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译本读者之间的关系,突出主体之间的“冲突、对峙与对话”,强调符号转换是主体之间在共同参与生产符号与阐释符号过程中的互动。互文性理论对主体间性的关注是基于后结构主义的理念,认为符号形成了文学艺术的先在阐释结构,主体对符号的理解和阐释是文学历史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主体对符号先在阐释结构的认同度反映了主体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性选择,从而凸显主体间性在文本符号转换中的作用:表层文本符号(象似性一级符号)表现了符号及文化传统对作者的影响,文本之间的映射和对话则是深层次的对话与互动,表层与深层的意义之和即是符号转换的对象,它以理解、阐释和再创造的方式在目的符号系统内创生新文本。在主体间性问题上,互文性不仅反映主体间接受与传承

的一面,更突出了创作主体对先在影响的反叛效应,这正是符号存在无限阐释可能性的原因,也隐含着皮尔斯之“符号代表项—对象—解释项”的符号载意与符号转换的三元关系模式,即将文本视为一种显性的存在符号,将主体视为一种知性存在的解释项,将文化视为一种隐性存在的符指对象。

从翻译符号学角度来看,应该强调以下几点。第一,翻译活动具有垂直互文性质,它不仅要处理一段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对话性和互文关系,更要理顺一个语篇对其他语篇的引用及应答关系。第二,翻译活动关注广义互文性,它不仅在精密的语言形式批评范围内分析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可论证的互涉关系,还从广义互文性(也称解构主义互文性)出发,把人类的各种知识领域、表意实践,甚至把社会、历史、文化等都看作翻译的参照文本。第三,翻译活动应遵循显著互文性原则。互文性可分为显著互文性和构成互文性,前者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公开地被利用到一个文本之中,如有引号、有明示或暗示符号;后者则是按照各种体裁或语篇类型来建构一个文本。显然,翻译活动面对的是符号转换,而不是体裁和风格的变异。第四,翻译活动兼顾被动互文性和主动互文性。被动互文性构成语篇内部的连贯和衔接,并产生意义的连续性;而主动互文性则激活语篇之外的知识和信念系统,因而文化蕴涵和知识结构都囊括于其中。第五,翻译活动允许积极互文性的存在。积极互文性是指当互文性要素进入当前文本后,发生了“创造性的叛逆”,与原文本相比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当前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与积极互文性相对的消极互文性则是指互文性要素进入新的文本后,与原文本相比意义没有发生变化。一般来说,科学翻译和学术翻译要求尽可能完整精确地再现他人的原意,不能有丝毫的增加、缩减和改变。也就是说,此时消极互文性占主导。但文学和其他体裁的翻译活动则允许“创造性的叛逆”或“翻译的再创作”,与原文本相比,译文产生了新的意义,与原文本形成了某种对话关系。

## 6. 符号功能与翻译

较早从语言学角度对符号功能加以理性划分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布勒(K. Bühler),他(Bühler 1990)区分出描述功能(即陈述各种事实)、表达功能(即表达发话者各种特点)和呼吁功能(即影响受话者)3大语言功能。之后,捷克学者穆卡洛夫斯基(J. Mukarovsky)提出了体现智能言语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体现情感言语活动的表达功能。雅可布森认为,语言交际离不开发话人和受话人,发话人将信息传送给受话人,信息需结合相关语境才能生效,受话人想深入语境须凭借与发话人享有的通用或部分通用的符号和使用符号的规则,同时保证两者间通畅的交流渠道。他还提出了语言符号的6大功能:1)情感功能:以发话者信息为焦点,重在说明发话者对陈述内容的态度,即表达出的态度和情感;2)意动功能:以受话者接受信息为焦点,重在对话者施加情感或态度影响,使其被说服、召唤;3)指称功能:以信息形成的语境为焦点,关涉参与对象、信息所指或认知内容,强调语境信息的所指内容,故亦称认知功能或指涉功能;4)元语言功能:以信息所用代码为焦点,关注语言符号本身的使用,阐明语码使用方式,如用注释、定义、术语等方式阐释语言现象;5)交际功能:以联络方式为焦点,侧重发话者与受话者的接触行为,旨在开启、维持、延长、结束交际行为,其中伴有大量的客套话语或仪式性语言符号;6)诗学功能(亦称审美功能):以信息本身为焦点,以自然语言符号为背景,突出个性化语言符号的美学功能前景及信息内容可感知的层面,即词汇表达了什么。(Jakobson 1960)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在《语言与翻译》(1975)中提出了“语义—符号学”翻译模式,认为语义是符号的功能,同时也是翻译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而把翻译中的语义问题纳入符号学分析视角。就翻译符号学而言,符号的表达、描述、呼吁、社会、情感、意动、指称、元语言、交际、诗学等功能,均以自然语言符号为背景,构成信息文本符号转换的类型依据。译者根据各类文本组篇范畴的特点,阐释文本信息内容,将其解码为信息中介文本,再借助译码使用规则或惯例,按照文本类型功能重组具有极大相似度的信息文本,从而完成信息文本的符号转换。此外,符号的元语言功能除了作为符号转换的类型依据外,还可服务于符号转换的本质、过程、行为、规律等的理论阐述。了解各类符号功能对应的文本类型特征,有助于译者从宏观上把握信息文本的类型、组织布局模式、信息焦点、信息传递指向和文本主旨,从而在阐释和解码基础上用另一门语言符号以最大的相似度呈现同一类型的信息文本。

### 7. 符号守恒与翻译

符号守恒指符号承载的意义或信息在符号转换前后保持不变。信息由符号载体承载,包括附带和伴随在载体上的空间和时间特征、属性、状态等信息。信息的采取量与需求量有关,有限度之分,伴随和附带在载体上的信息因而也有限度,各自的参数值总和不变,符号信息就能守恒。

符号守恒应克服语码视差情况。一种语言符号承载的信息内容传递到另一种语言符号时,不同语言符号系统的阐释者凭借自己所在系统的规则或惯例,观察、呈现和阐释符号及其所指对象,也就产生了语言符号视差。所谓视差,指大脑对符号的阐释与所指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之所以会产生视差,是因为符号使用者因认知不足,未能正确把握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将符号的描述和表达视为绝对对应现象,并全盘接受,忽略了从语言符号阐释中获得的信息本身与现实之间存在的误差。实际上,语言符号不仅能呈现事实,也能因不正确阐释而歪曲事实,这样难免会出现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不对应的现象。从符号转换角度看,译者当注意:第一,言内意义层面,语词组合关系并非绝对的单向显性关系,有时会因语境的制约作用出现多层立体关系;第二,指称意义层面,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本身的强制性与语境框架下的随机性并存,存在因一词多义现象而出现的词义边界不明与语境制约作用,以及不同语符系统内对应词语与现实所指不同等现象;第三,语用意义层面,指称意义成为背景,交际信息中语用意义构成动态的核心。可见,符号转换过程中要注意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层面语符所指与能指之间的正确对应关系,以便保证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等值。

要关注符号守恒与信息衰减和缺失的问题。信息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生成,其中有两个环节非常重要。第一个环节是信息加工处理环节,即编码和译码环节。虽然编码和译码都要依据客观现实知识,但编译的主体是人,主观因素的介入无法避免,这就为意义的生成与理解带来了一定的变数。第二个环节是信息传递环节,3个主要结点是信源、信道和信宿,它们在信息的容量及表达方式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作为信源,外部世界提供的信息是无限的,而作为信道,符号媒介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符号传递无限的信息,必然造成符号意义的模糊与不确定。但正是意义的不确定构成了信息的价值所在,才有了交流传递的必要。作为信宿,人类的大脑需排除“噪声”的干扰,运用有效手段去消除意义的模糊性,使不确定的意义逐渐达到相对的确定,从而在交际系统中最大限度地产生正反馈回输(王铭玉 2004: 220)。

## 8. 结语

正如当年索绪尔对符号学的预测一样,翻译符号学也应有它存在的合法权利。关于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题,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系统论述这一问题的专著,散见的一些文章也只是部分地涉及符号学对翻译研究的见解,亟需系统化的论述或整合。这是一个诱人的领域,值得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翻译符号学不但可以丰富符号学的类型研究,扩展符号学研究的范围,还可使符号学研究在整体上更上一层楼。站在中外文化互动和中国文化对外宣传的“桥头堡”,针对文化互动过程中的符号转换问题开展翻译符号学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发展和走向国际舞台过程中的符号转换问题,势必会为本土翻译学、符号学乃至世界符号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势必会将中国符号学推向世界符号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这一带有中国特色的符号学必将在世界符号学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 翻译符号学目前国内还鲜有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的贾洪伟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吕红周博士近年的相关成果受到了学界关注,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二位的热心帮助,他们的思想和建议对文章的形成很有助益,在此谨致谢忱!

## 注释:

- ① 顺应(adaptation)原为生物进化论概念,由比利时语言学家兼国际语用学会秘书长维索尔伦(J. Verschueren)于1999年引入语用学,主张从认知、社会和文化入手,以语言的选择性、变异性、协商性、顺应性为框架和前提,再从顺应的语境关联、结构对象、动态性和意识凸显性4个层面综合地观照语言现象。
- ② 前景化(foregrounding)原为绘画领域的术语,指画家以其他人物为背景凸显特定的艺术形象,从而达到某种艺术效果,由捷克形式主义大师穆卡洛夫斯基引入语言文学研究,后经雅可布森等布拉格功能学派学者的阐发,又经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 Leech)、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的发展,形成了以自然语言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为轴心的组合前景化和聚合前景化理论思想。

## 参考文献:

- [1] 费斯克. 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 许静,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 库尔. 环境界与模塑[C]//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 周劲松,赵毅衡,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46-61.
- [3] 库尔. 生物符号学的进展:我们在对意义生产的基本机制的发现上走到了何处[C]//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 彭佳,汤黎,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61-70.
- [4] 吕红周,单红. 略论隐喻的符号间性本质[J]. 外国语文,2014,(2):75-79.
- [5] 莫里斯. 指号、语言和行为[M]. 罗兰,周易,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6] 皮尔斯. 皮尔斯:论符号[M]. 赵星植,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 [7]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8] 特洛普. 符号域:作为文化符号学的研究对象[C]//生命符号学:塔尔图的进路. 彭佳,汤黎,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31-40.
- [9]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10] 王铭玉,等. 现代语言符号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下转第18页)

- [12] Kittel ,H. , et al. *Übersetzung: Ein internationales Handbuch zur Übersetzungsforschung. 1. /Translation: A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K]. Teilband.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4.
- [13] Peirce ,C. 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Charles Hartshorne , et al. Cambridge/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 [14] Posner ,R. , et al. *Semiotik. Ein Handbuch zu den Zeichen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von Natur und Kultur/ Semiotics: A Handbook on the Sign-theoretic Foundations of Nature and Culture* [M]. Berlin/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7-2004.
- [15] Sebeok ,T. A.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Semiotics ( 2<sup>nd</sup> Ed.)* [K].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4.
- [16] Sütiste ,E. Roman Jakobson and the topic of translation reception in academic reference works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8 ,36 ( 2) : 271-314.
- [17] Torop ,P. Translation as translating as culture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2 ,30 ( 2) : 593-605.
- [18] Toury ,G. Translation: A cultural-semiotic perspective [C] // A. Sebeok.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6: 1111-1124.
- [19] Лотман Ю. М.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 [C].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

( 责任编辑 陈 勇)

( 上接第 10 页)

- [11] 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M]. 韩水法, 莫茜,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12] 赵毅衡. 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0, ( 2) : 2-8.
- [13] Boase-Beier ,J.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M]. New York: Continuum ,2011.
- [14] Bühler ,K. *The Theory of Language: The Representational Function of Language* [M]. D. F. Goodwin. Tran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 [15]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16] Jakobson ,R.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C] // T. Sebeok. *Style in Langua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0: 53-56.
- [17] Lotman ,J. On the dynamics of culture [J]. *Sign Systems Studies* ,1977 ,( 2/3) : 355-370.
- [18] Бархударов Л. С.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M].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 责任编辑 陈 勇)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 **Disciplinary Connotation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by WANG Ming-yu, p. 1

Translation Semiotics a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field of semiotics considers sign convers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as its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discusses in brief the content of this newly-established discipline in seven aspects, including semiosis, sign-action, semiotic relations, semiotic hierarchy, intersemiosis, semiotic functions, and semiotic equations, and foresees its prospect in terms of extending the types and scope of semiotic research and of inspir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 **A Translation-Semiotic Perspective of Jakobson's Tripartite Division of Translation**, by JIA Hong-wei, p. 11

Based o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Jakobson's tripartite division of translation (intralingual, interlingual and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and its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ese academics will be traced in order to reveal its influence over linguistics,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worldwide and point out the significance to criticize this tripartite division in terms of the broad sens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classifications of signs. Gideon Toury (1986), Peeter Torop (2002), Huang Zhonglian (2015) have criticized this division and constructed their own systems, but still with their problems and limita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with reference to Lotman's semiotic domain and its theories, a new division system of translation (intra-domain, inter-domain and supra-domain translations) for translation semiotics.

### **The Socio-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Translation Motives**, by TONG Ying, p. 19

From a macro point of view, strong and weak trends appeared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forming an imbalance in power structure in a socie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ructure. Starting from the translation motives, the translator ought to choose between domestication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big society" and the "small society". From the micro level, social structure gives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al context to influence the "habit" of translator to conform to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o influence the expression of translator through "social dialect", thus helping translator to determine the intended readers. In turn, the translator can realize translation motives by rea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y on social structure.

### **Subject and Object Relative Clauses in Chinese: Their Relative Processing Advantage in Comprehension and Its Explanation**, by YAO Lan, p. 40

The controversy remains to date over the relative processing advantage of subject relative clauses to object relative clauses in Chinese. Howeve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relevant experimental data point to advantages with object relative clauses. While a memory-based theory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data, an experience-based theory can. Since a memory-based theory depends on such syntactic concepts as movement and lacks explanatory pow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possibility of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being regarded as a noun-modifying construction and suggest a direction for future experimental research to test it.